

□宫宏宇  
GONG Hong-yu

# 从利玛窦到李德伦——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

Western Classical Music in China From Matteo Ricci to Li Delun

中图分类号: J605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003-0042(2006)04-0138-03

2004年纽约Algora出版社出版了Sheila Melvin和她的丈夫Jindong Cai合作撰写的《红色狂想曲: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是怎样生根发芽的》一书,这是继美国学者Richard Kraus《钢琴与政治在中国:中产阶级的抱负及其为西方音乐所进行的奋争》、德国学者Barbara Mitller《危险的乐曲:音乐政治在1949年后的香港、台湾、中国大陆》<sup>1</sup>问世后又一部有关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的著作。但与前两书不同的是,此书作者之一Jindong Cai生长在北京,早期的音乐教育也在国内,文革期间开始指挥乐队。1985年到美国后,Cai先后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和辛辛那提音乐学院就学,获音乐博士学位。他曾随著名的指挥家伯恩斯坦学过,指挥过很多国际上颇有声望的交响乐团。Cai从2004年开始在斯坦福大学任职。Cai可以说是西方音乐在中国的直接目击者和经历者。Cai的妻子Sheila Melvin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生于华盛顿,毕业于宾西法尼亚大学。写本书前,Melvin曾任美中商务委员会(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住上海代表,从20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经常为《亚洲华尔街时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多家报刊撰写过有

关西方音乐在中国以及中国当代音乐发展的系列报导。Melvin利用在国内居住的便利条件,访问过多位从事西乐的老音乐家,如李德伦、周小燕、谭抒真、黄飞立等。由于丈夫的关系,她和中国新潮作曲家也接触频繁,对中国音乐界的历史和现状有比较深的、直接的了解。前两书的作者则不同,一个是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另一个虽说研究过中国新潮作曲家,但近年来已转向对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研究,她研究上海

---

收稿日期: 2006-06-26

作者简介: 宫宏宇(1963—),男,新西兰国立尤尼坦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语言学系高级讲师。

<sup>1</sup> Richard Kraus, *Pianos and Politics in China: Middle-class Ambitions and the Struggle over Western Musi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Barbara Mitller, *Dangerous Tunes: The Politics of Music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the PRC since 1949*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8). 前书笔者曾撰文介绍,见《中国音乐学》2004年第一期,138-41页。

《申报》的专著, 于 2004 年已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sup>④</sup>作者背景的不同决定了《红色狂想曲》一书是一本学术界之外的普及性读物, 是为了让西方读者特别是对音乐感兴趣的读者对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传播和演变有所了解。全书中没有一个谱例, 专业术语也不多, 对音乐外行不构成任何威胁。但正因为它是非学术性专著, 不必像学术著作那样恪守成规。值得一提的是, 此书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 但也绝不是一般的报告文学, 两位作者在研究工作上还是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从书后所列将近 12 页的参考书目中即可看出。

《红色狂想曲》问世后, 受到了西方读者的关注。美国之音的 Shannon Conrad 撰文评论说: “这是一本结构严谨但可读性强的著作, 无论是学者或是对中国文化、历史、或艺术感兴趣的人都应该拜读。”但相对来说来自学术界的评论不多, 可能与此书的体例与出版者非学术出版社有关。《红色狂想曲》一书除前言和结语外, 有正文 9 章 362 页。还有照片 18 张。此书对西方古典音乐从晚明到当代在中国的起源、发展、欣赏和应用进行追溯, 但并不是按照历史朝代的先后组织。重点是对不同时代(晚明、晚清、民国、二战、解放后、文革、文革后的改革开放等)的不同人物(利玛窦、新教传教士、梅百器、富华、萧友梅、俄国难民音乐家等)所传入的西方音乐给中国音乐在 20 世纪的发展带来的不同影响进行叙述。如第一章(远东最好的交响乐团)以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 1918 年冬到上海为主线, 叙述上海工部局乐队在 20 世纪初的成立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廖辅叔在《梅百器其人其事》一文中说, 梅百器是“1920 年他接受斯特洛克的聘约来中国举行钢琴音乐会”的,<sup>⑤</sup>而梅百器自己明确指出, 他是 1918 年冬到上海的, 韩国在《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一文中虽推测说梅百器第二次来中国应是 1919 年, 但他引用工部局的年报上的登记确定“梅百器就任乐队指挥时间是 1919 年 9 月”。<sup>⑥</sup>看来梅百器 1918 年冬到上海应该比较可靠。第二章“音乐之航程”, 作者把读者带回到晚明的万历年间, 从利玛窦献西琴讲到康熙(1661—1722)、乾隆(1736—96)两朝时耶稣教士传入的西洋乐器, 最后简单的叙述了一下鸦片战争后传入的西洋音乐。这一章没有什么新意, 因为利玛窦献西琴, 方豪、阴法鲁、陶亚兵等都论述过。国外学者如 Vincent Cronin、George Dunn、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本泰子

也提到过, 特别是史景迁的论述最可读。<sup>⑦</sup>康熙乾隆时传入清宫的西洋乐器和乐理也有学者专门研究过, 如德国学者 Gerlinde Gild-Bohne 1990 提交给哥廷根大学的博士论文就是专门研究《律吕正义》的, 余少华在 1996 提交给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对 18 世纪满清宫廷中的西乐也有很详细的论述。<sup>⑧</sup>第三章“播种与收获”比较有意思, 以上海为中心兼及哈尔滨, 整章由七节组成, 分别讲述谭抒真、萧友梅、流落到上海和哈尔滨的俄国难民音乐家、梅百器与工部局乐队、国立上海音专、冼星海、聂耳与抗战时期的救亡歌咏运动等。第四章讲述上海成为孤岛之后萧友梅怎样为了不让西方音乐的火种熄灭而惨淡经营音专、谭抒真等怎样为生活等原因所迫离开工部局乐队、梅百器时代的结束、李德伦等去延安等。第五章(从古典音乐家到共产主义者)以李德伦为主线, 兼及另外几位从上海到延安的音乐家, 叙述毛泽东的艺术思想及延安的音乐生活。这一章作者对澳大利亚学者 David Holm 的《革命中国的艺术与意识形态》引用较多。<sup>⑨</sup>但对陕北的秧歌运动、延安的整

④ Barbara Mitler, *A Newspaper for China: Power, Identity, and Change in Shanghai's News Media, 1872 - 1912*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⑤ 廖崇向编《乐苑谈往》, 178 页。

⑥ 韩国《音乐文集》卷四, 149 页。

⑦ Vincent Cronin, *The Wise Man From the West* (London: Rupert Hart - Davis, 1955), pp. 178 - 80; Dunne, S. J., *Generation of Giants* (London: Burns & Oates, 1962), p. 79; Jonathan D. Spence,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4), p. 197; 本泰子《上海乐人之都: 西洋音乐在近代中国之发轫》(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3), pp. 1 - 3.

⑧ Gerlinde Gild - Bohne, "Das L - L - Zheng- Y- Xubian: ein Jesuitentraktat über die europäische Notation in China 1713". *Orbis musicarum* 8 (Göttingen University, 1990); 余少华 (Yu Siuwa), "The Meanings and Cultural Functions of Non - Chinese Musics in the Eighteenth - Century Manchu Court" (Ph. D. dis., Harvard University, 1996).

⑨ David Holm, *Art and Ide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风运动、鲁迅艺术学院的文艺工作者脱胎换骨的过程、延安40年代秧歌运动的起源及政治背景等缺乏细致分析。相比之下,朱鸿召的《秧歌是这样开发的》一文(见《上海文学》2002年10月号)读起来更有趣味。第六章(新现实与新考验)、第七章(文革)、第八章(音乐与权力)、第九章(新时代)在笔者看来乏善可陈,对国内的读者参考意义也不大。虽说Melvin为了讲述西乐在新中国的命运采访了很多当事人,但主要的叙述建立在二手材料之上,对六七十年代中国对外发表的用于宣传的官方刊物依赖过多,总体上缺乏客观批评的眼光。如关于贺绿汀和李德伦在文革中的遭遇主要取材于国内近年来出版的有关传记(如史中兴的《贺绿汀传》和罗筠筠的《李德伦传》)。新闻报道的成分太多,读起来有看伤痕文学的感觉。史中兴和罗筠筠的著作作为非学术性读物,无疑对我们了解文革有益,但作为传统意义上人物传记,其本意是为传主青史留名。这种传记在叙述上以褒为主,在行文上文学成分过多。对传主自身所述历史事件缺乏印证。《红色狂想曲》一书特别是最后几章也有此缺憾。

法国汉学家者Marie-Claire Bergre在其《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把1911到1937这二十多年称为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繁盛期,<sup>④</sup>她所说的资产阶级主要是上海的新兴中产阶级。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的兴起是与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息息相关。德国社会学家Max Weber在《音乐的理性的社会的基础》一书中通过对钢琴的起源、钢琴音乐及中产阶级兴起的社会及政治环境的追溯后提出了钢琴是属于的中产阶级的乐器之理论。<sup>⑤</sup>受Weber理论的启发,美国学者Richard Kraus在《钢琴与政治在中国》一书中指出,西方音乐在中国的社会基础(中国的中产阶级,主要指城市新兴资产阶级)比较薄弱,西方音乐不是无阶级的国际语言,中国人对它的接受并不是出于纯粹的审美需要,而是有其极浓厚的功利意识;西方音乐在中国沿海都市的传播和中国中产阶级对西方音乐的接受,除了表明中国中产阶级对以西方

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性的渴望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显示了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自身所有的势利性。《红色狂想曲》的作者虽然开宗明义地讲此书的目的是讲述西方音乐怎样在中国生根,但从整体来看,他们叙述的(除延安外)仍是西洋音乐在中国都市间的流传,提到的人物从阶级属性来讲也非中国的工农阶层。顺便提一下,近年来受哈贝马斯理论的影响,国外学者对近代(指晚清及民国时代)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流传和变迁以及中外文化的融合颇为关注,特别是上海开埠后受西方影响的城市文化和公共空间的研究更是近年西方汉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sup>⑥</sup>《红色狂想曲》对以西方古典音乐为代表的新兴音乐文化在中国的兴起和中外音乐家之间交往互动的描述虽缺乏鲜明的论点,但由于取向特殊,无疑将会引起更多学者对此的兴趣。

(责任编辑:张振涛)

(七) Marie-Claire Bergre, *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1911-1937*. Trans. Janet Lloyd,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④ Max Weber, *The Rational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Music*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58).

⑤ Leo Ou-fan Lee,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Gail Hershatter,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Catherine Yeh, *Shanghai Love: Courtesans, Intellectuals, & Culture, 1850-1910* (Seattle &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